

# 论建安游宴诗与五言诗成立的关系 ——以木斋相关研究为中心

杨丰勋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 中文系,台湾 高雄 80424)

**摘要:** 游宴诗的出现是中国文人第一次群体性写作。在汉赋的时代继承中,建安文人在多元的尝试下,寻求到五言诗的写作形式。由汉到魏的文学演变过程,可称之为“赋的诗化”之演变,形式上的诗化、内容上的抒情化以及表现主题的多元化。此时赋作篇幅短小精悍,内容从汉赋的宣德尽忠的经学传统,转变为个体生命情感的书写,摆脱政治的附庸。五言诗作为一个新兴的文体,继承了赋体的变革并超越赋体的成就,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的新时代,从而造就出“古诗十九首”的冠冕之作。

**关键词:** 游宴诗; 五言诗的成立; 建安文学; 邺下文人集团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2-0081-07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yan Poetry in Jian'an and the Founding of Pentasyllabic Poems

——Centering on MU Jai's Correlational Research

YANG Fengx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80424, Taiwan)

**Abstract:** Youyan poetry is written collectively by a group of Chinese schola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era to inherit the Fu of Han, Jian'an literati found the style of the five-character poetry in their attempt to diversify the poetry writing. The literatur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Han to Wei was called “poetization of Fu”, namely poetization in form, lyric in content and diversification in theme. At that time Fu was terse and forceful, turning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of Han Fu, which propagandized the highest virtue but loyal filial piety, into the style focusing on individual life emotion, which got rid of political vassal. As a new style, pentasyllabic poems inheri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 surpass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Fu style, opened a new era of pentasyllabic poems in Chinese literature, creating the best work in “19 ancient poetries”.

**Key words:** Youyan poetry; founding of pentasyllabic poems; Jian'an literature; the scholar group in Ye

关于建安游宴诗在中国诗史上的意义,如魏宏灿强调邺下文学集团的贵族化特征,<sup>[1]</sup>张兰花则强调建安诗歌由率真自然、骨气奇高向华赡妍丽、词采华茂的文风嬗变过程,<sup>[2]</sup>都反映出建安十六年是个非凡的年代。但亦有学者对建安游宴诗与五言诗成立持有不同的见解,认为五言诗成立应早于建安,如

收稿日期: 2013-02-16

作者简介: 杨丰勋(1983-),男,台湾高雄人,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台湾高雄市立青年国中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

黄坤尧先生认为,西汉乐府的五言句法已表现流畅,诗人能掌握类似的五言句法,故西汉的五言诗早就呼之欲出。<sup>[3]</sup>本文尝试以大文学史观的关注、文学演变的法则为前提,依序就五言诗的发展脉络、游宴五言诗的写作缘起、游宴诗创作时代背景分析与游宴诗所反映出的五言诗成立等,层层剖析,在木斋先生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试图进一步阐发五言诗成立时间的问题。

## 一、五言诗的发展脉络

根据夏传才的统计,五言句占整部《诗经》句子的 5.1%,除了占 92.3% 的四言句式最多外,五言句是《诗经》中第二多的句式。<sup>[4] (p11)</sup>这样的情况可知,五言的表现方式在《诗经》中已经出现,但仅属偶然性,未成系统,不能算五言诗由此出现。至战国时期屈原的《离骚》诸篇较接近散文,远离诗歌精炼的主要风格。到了汉代,这是一个属于赋的时代,汉赋延续了《楚辞》中扩大篇制、散文句式、骈辞丽语、铺张夸饰等特色,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五言诗作非常罕见,东汉班固的《咏史》诗被定位为最早齐言式的文人五言诗,作品风格上,草创之初未有佳作得以仿效,故钟嵘《诗品序》称之“质木无文”是可理解的状况。从班固到建安时期,五言诗人屈指可数,且量少质差。这反映了五言诗的生命尚属于不连续、无规律、偶然的情况,因此自《诗经》之后一直到建安之前,中国诗歌史进入了一个长达八百余年的黑暗期,可谓为“诗续断层”。<sup>[5]</sup>造成如此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汉代经学与辞赋写作垄断了文坛,文人们花了大量心血研究经学,加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将赋的功用定位于“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sup>[6] (卷一)</sup>一切创作在于“立德、立功、立言”,因此文学成了政治附庸,这种缺乏个人生命展现、空泛言志的写作,诗人心灵受到箝制,由此出现中国诗歌的黑暗期。

汉代乐府风格主要以杂言为主,建安以前,齐言式的五言乐府还是少见。就表现技巧而言,曹操所作的五言歌行,皆可看出前后期创作成熟度有极大的落差,反映了五言乐府至曹操依旧未达成熟水平。争议较大的部分,是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中所收录的几首汉代五言乐府佳作,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这在五言诗歌的发展上是极度不合理的,我们可推测由于郭茂倩本身是宋人,距汉已远,且古人对于汉魏之别,界定从未分明,经木斋先生严密考证,几乎可确定非汉代的作品。<sup>①</sup>从时代意义而言,乐府的出现是因为“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sup>[7] (卷三十)</sup>这个制度沿仿了周朝采诗之风,但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声色娱乐的需要,已丧失原本的精神,也没有社会诵习尊崇之风,故在当时未发挥出它的社会价值。因此汉乐府的作品并未受到当时时代风气的重视,缺乏系统的收集、整理、编订成集。<sup>[5]</sup>由上述可知,五言诗自《诗经》以降,受诸子哲理散文、史传散文和汉代赋颂的垄断之影响,诗歌的觉醒还是须归于大量创作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sup>[8] (p27)</sup>钟嵘《诗品》总论中写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sup>[9] (p106-107)</sup>均说明了诗歌于建安时期文学写作的风行,进入了群体写作的时代,特别是对五言诗的写作更是意义非凡。

## 二、游宴五言诗的写作缘起与成立

如木斋先生所言,游宴诗是孕育新兴五言诗体制的摇篮,将五言诗的创作带向了群体自觉转型的枢纽。<sup>[10] (p134)</sup>会有如此的结果,起因于汉帝国的瓦解,诗歌写作突变的机会,试分析如下:

1、曹魏政权的稳定:建安九年(203)八月曹操打败袁绍,取得邺城作为根据地,<sup>[11] (p85)</sup>此后邺城成为了曹魏的政权所在。到建安十三年(208)荆州刘表投降,曹操基本上已建立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强

① 参见木斋《〈陌上桑〉创作时间、作者考辨》,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5月此二篇论文。

大曹魏政权。有了政治稳定的基础,公子哥们才能尽情地游玩、享乐,全心投入于自己所爱好的文学之中。因此《文心雕龙》说这个时期的作品“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就是因为曹魏政权的稳定,游宴诗才得以顺利创作;2、曹氏父子对文学的热爱:权力中心的曹氏父子对文学的爱好,必然是游宴诗出现的主要推力。《魏书》中说曹操“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sup>①</sup>说明了曹操以自己的实践推动了邺下文人的创作。由于局势相对安定与曹操爱好文学、奖掖风雅的原因,那些因战乱而流亡的文人,先后聚集于邺城,邺城也成了第一个中国文人集团聚集的根据地。毫无疑问,曹操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当然领袖。但曹操军政事务繁忙,在众多孩子中,曹丕与曹植延续了父亲在文学上的天分,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天下向慕,与客如云”。<sup>②</sup>曹丕具体地组织、领导了邺下文人集团。写作思想上将曹操的政治理想升华为群体的个人生命情感的写作;3、收揽天下文人:曹操对文学的热爱起了具体的倡导作用,《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诗章。”邺下文人集团从建安初阮瑀、徐干等进入曹操幕僚开始,到建安十三年王粲等归来为止,十余年中集合了“盖将百计”的文学人才,四方名士,尽皆收揽,几乎网罗无遗,可见其用心程度。邺下文人集团在“三曹”带领下,六子加入(孔融早亡,不在邺下文人集团之内),还有其他文人如:蔡琰、杨修、繁钦、吴质、丁仪、丁翼、邯郸淳、曹彪等,整个文坛有了极佳的切磋环境。这些邺下文人理所当然地成了游宴诗的创作者。<sup>[12]</sup>依据曹丕《与吴质书》的记载,曹氏兄弟和那些邺下文士们“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sup>[6](卷四十二)</sup>文风之盛可想而知;4、铜雀台的建成:当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曹魏统治区的政治相对稳定,生活因此安逸,他们无须戎马倥偬,也不必颠沛流离,于是便开始过起皇族的游宴生活,因享乐的需求,邺城有了大兴土木的必要。铜雀台主体建筑约建成于建安十五年冬,不仅象征着曹魏政权的巩固与强盛,也提供了三曹与邺下文人得以宴饮享乐、交际诗赋的场合。曹操曾率诸子登台,使各为赋,铜雀台俨然成为了邺下文人集团较劲文才的场所与游宴诗的活动舞台;5、清商乐的兴起:依木斋先生研究,清商乐是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相较于传统雅乐的严肃,清商乐更为注重娱乐性和抒情性,符合宴饮活动的需求,可用于表现男女相爱的主题以及女性化的歌诗。所以清商乐在建安十六年后的游宴活动里,文人们为新兴的清商乐填写歌词就成了新的文人时尚,清商乐成为五言诗成立的音乐基础;<sup>[10](p75)</sup>6、曹操《求贤令》的颁布:曹操是传统儒家思想的解构者,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辟者、奠基者,此举象征着曹操完成了他政治人生转型的历史使命,为建安时期的文学自觉、思想解放,打下了政治基础,并引发了建安时代士风转型,一切诗歌创作不再只是如同汉诗般的空泛言志、宣扬儒礼教条,让诗歌回归到个人生命的表现,有了开阔的天地,才能让诗歌的审美眼光屈尊于歌舞宴会之上,此为游宴诗的思想基础。<sup>[10](p80)</sup>

以上六点是游宴五言诗得以产生的原因。关于五言诗的成立,以木斋先生考证为基础,我们可以归纳出:建安十六年以前,是建安文学的开拓期,以曹操的个人自觉为代表,提供了邺下文人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创作环境。建安十六年可作为跨时代的标志,开启了建安五言诗真正意义上的发端。此时有两次意义深远的游宴活动“南皮之游”与“西园之游”。在游宴活动中,二曹六子<sup>③</sup>均有参与其中,在诗人群体写作下,选择了新兴的五言诗作为创作尝试的体裁,并发掘了五言诗的声情之美,在五言诗不发达的时代,建安游宴诗的创作却是大量使用了五言诗的表现方式,且扩大了诗歌的题材,故称之为五言诗的成立。

邺下文人们由于对五言诗新体新鲜感的热衷,在集体写作、彼此切磋的环境下,渐渐学会了五言诗的写作技巧,当离开了游宴场合,必然可以对五言诗的写作题材加以扩充,如同木斋先生的比喻“曹丕

①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

② 参见《三国志》卷一一《魏书·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③ 所谓的二曹六子,指的是曹丕、曹植兄弟与陈琳、王粲、阮瑀、应玚、刘桢等五子,徐干未见纪录,但随后有《清河挽船士新婚》、《室思诗》等,故不可排除在外;曹操因建安十六年六月备战西征马超,未能投入游宴活动,七子中的孔融早亡,故此两人排除在外。

的西园,就像是一所五言诗歌的学校,曹氏兄弟与六子一旦走出这所学校,广袤的社会人生必然会触发他们新的写作冲动。”<sup>[10]</sup>建安十六年之后,五言诗的创作便不再中断,成为了中国诗歌创作形式的主要体裁。

### 三、游宴诗沿袭的两个传统

当时的文学创作背景,因五言诗还尚未发达,处于尝试阶段,邺下文人集团除了创作大量辞赋外,也尝试创作了大量诗歌。在体例上,无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皆有所尝试。以三曹为例,曹操一生的诗作根据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今存约二十二首,其中四言、五言、杂言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曹丕的五言诗作比例亦不高。唯曹植是大力创作五言诗的第一人,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整个建安诗现存235首,其中五言诗162首,曹植的五言诗就有65首,占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sup>[13]</sup>他的作品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确立了五言诗在诗坛的地位,使之从此成为最重要的诗体之一。就当时文学创作分析,建安十六年沿袭的文学传统主要在诗歌与辞赋这两个方面。

(一)建安诗歌与辞赋传统的关系:在建安时期,我们还是必须承认,曹魏延续了汉代的写赋传统,三曹与邺下文人都留有大量的辞赋作品,辞赋的写作必然影响到五言诗形成的艺术风格。在五言诗转变以前,建安赋已先有改变:1、篇制短小化:汉大赋如司马相如所作的《子虚》、《上林》,主要描写帝王的享乐生活,全篇结构宏伟、铺张夸饰、辞采繁缛,这是当时赋作的特色,到了汉末与建安赋作,篇幅普遍短小,摆脱了两汉堆砌辞藻之习,能够抒发个人的情感,走向诗缘情的审美王国。代表作品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游观赋》等。如马积高先生所言“短赋的新发展是赋的诗化或赋向诗回归的一种表现。”<sup>[14]</sup>2、赋的抒情性的强化:建安时期的文人大多都经历了汉末社会的动荡和颠沛流离,他们对生命本身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赋作的重心便由对外在世界的繁富景象的描摹转向对个体内心情感层面的深层次挖掘。这一改变影响到赋的题材选择上,便是文人的视角由宫廷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由对政治事功的追求和歌颂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由抒发。<sup>[15]</sup>代表作品如曹丕《感离赋》、曹植《洛神赋》等。这些赋作中的抒情已经脱离了汉代言志的传统,开始向个人生命的抒情前进。

诗与赋的关系是彼此互相影响、交互作用。当时亦流行同一主题并作一诗一赋的习惯,如曹丕的《寡赋诗》与《寡妇赋》,但就两首作品看来,当时诗、赋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建安赋的改变,连带转换了建安五言诗风,五言诗与汉魏之际辞赋的演变有着某些天然的血缘关系:1、语言上的辞藻追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的“诗赋欲丽”精神,就《诗经》的质朴传统看来是背离的,但却恰恰符合汉赋风格中所追求的“铺采”精神。如曹植《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2、结构上的善于铺排:如曹丕《大墙上蒿行》、曹植《名都篇》都是大量铺排的代表例子,描写都邑子弟的田猎、饮宴极尽铺陈,这显然是受到汉代苑猎赋的影响。<sup>[16]</sup>3、诗句中的大量用典:如曹操《度关山》、《善哉行》等,连续引用了皋陶、尧、舜、伯夷、许由、齐桓、管仲、晏子、仲尼的典故,这也非属诗歌的传统。总之,建安诗歌由赋体而来,更超越了赋。由汉到魏的文学演变过程,可称之为“赋的诗化”之演变,形式上的诗化、内容上的抒情化以及表现主题的诗化,篇幅亦短小精悍,内容从汉赋的宣德尽忠的经学传统,转变为个体生命情感的书写,摆脱政治的附庸。五言诗作为一个新兴的文体,继承了赋体的变革并超越赋体的成就,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的新时代。

(二)五言诗由《诗经》四言传统而来:四言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可谓“正体”,但随着诗的发展,五言、杂言诗慢慢由《诗经》脱胎而出,建安五言诗必然受前期四言诗所影响。依木斋先生研究,在《诗经》时期,诗人们用比兴的手法,抒发了个人生命性情的感受,但汉代后,两汉人对“诗”尚停留在敬畏经典的阶段。两汉文人还不能自觉到,诗并非圣贤所专有,而是士人都可以写作的一种文学体裁,在这个时代的诗学观念中,还没有形成广义的“诗”的文学自觉观念。<sup>[17]</sup>四言诗随着时代的演进,渐不足以表达日益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内容,故钟嵘《诗品序》认为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人们当此

之时,寻找一种新兴的文体过程中,发现了五言诗的声情之美,犹如钟嵘所体会到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如此以齐言的五言诗作为创作的载体,取代了传统的四言或杂言,情感描写取代了传统汉诗的空泛议论,开创了五言诗创作鼎盛的高峰。

#### 四、游宴诗的写作研究

游宴五言诗相较于前期的作品,在音步、节奏上已达成熟水平,很少单音节、五字诗的痕迹;写作上带有某种为文造情、为诗而诗的成分,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言志,必然走向写景、抒情,也走向了华美一途,促进了两汉诗的“言志”传统走向“缘情”的文学自觉转型。<sup>[18]</sup> 以下就游宴诗的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分点论之:

##### (一) 游宴诗的时间问题

游宴诗的写作开始于建安十六年六月,“西园之游”初期作品反映出夏日的炎热与初游铜雀台的欢欣之情。如陈琳《宴会诗》:“凯风飘阴云,白日扬素晖。良友招我游,高会宴中闱。玄鹤浮清泉,绮树焕青蕤。”王粲《公宴诗》:“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从“凯风”、“蒸暑”,可以掌握二诗为六月之作。此外“清夜游西园”的活动在刘桢《公宴诗》“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提到了盛开的芙蓉、菡萏,此为夏季盛开之植物,故曹丕《芙蓉池作诗》、刘桢《公宴诗》、曹植《公宴诗》三首同主题的游宴诗均可视为建安十六年六月初游铜雀台的作品。且曹丕《芙蓉池作诗》中“逍遥步西园”等句,可推知是铜雀台刚建成之时诸事新鲜、万事美好的欣喜感受,应为六月之作。其后陈琳的《游览诗》二首提到“节运时气舒,秋风凉且清。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描写秋天的景致可视为第一期的接续之作。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耀炎光。”此为建安十六年冬季之作。

曹操因建安十六年六月备战西征马超,未能积极投入游宴活动,直到建安十七年正月凯旋而归,此时正是游宴诗鼎盛之时,曹操终于能够参加这次的游宴写作活动,时间上由曹植的《登台赋》可判断出节令为春天,故可推论出曹操于建安十七年正月做了《短歌行》这首伟大的游宴之作。推论依据为《今日良宴会》是“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宴诗,在木斋先生的严密考证之下,已可确定为曹植所作,<sup>[10] p167</sup> 此诗为呼应《短歌行》的即席唱和,阐发了父亲所吟唱出来“高言”的深沉意义。这点对五言诗的梳理有极大的意义,正因为有建安十六年游宴五言诗的训练,才会有建安十七年《今日良宴会》的产生,也才会有未来其他的“古诗十九首”创作。如此突破性的发现,如同张法先生所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sup>[19]</sup> 着实有理。

##### (二) 同题写作与彼此唱和《公宴诗》、《斗鸡诗》

建安文学以群体性的诗赋献酬、互相唱和为其主要特色,命题创作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命题创作由一人出题多人作之,当时称之为“命诗”、“命赋”,<sup>[1]</sup> 由三曹命题,文学侍从则是负责受命写作。中国古代文人群体唱和、写作,此风始于建安时期的曹操。根据《三国志》记载,建安十四年,曹操因赤壁失利而回师北上,过汉水之滨的襄阳,文士们有鉴于汉水神女的故事,便受命撰写同题《神女赋》,其中王粲、陈琳、应瑒和杨修之作至今犹残存于世,这即是建安诗赋唱和的开始。从此诗赋唱和或者同题命作便不绝如缕。<sup>[20]</sup> 如“建安十五年,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三国志·曹植传》)此外,曹丕以邺下文学领袖身分命题为文最为常见,曹丕曾自称“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瑒等同作。”(《初学记》卷一引《魏文帝集》)再如建安十七年阮瑀卒,曹丕悯其妻丧夫而曰“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始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曹丕《寡妇赋序》)这些都是当时盛行的命题创作。游宴诗具备了游戏与即席创作的性质,所以有多人创作同一题目的情况,具有唱和的性质,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唱和写作。

建安十六年六月,曹丕《芙蓉池作诗》、刘桢《公宴诗》、曹植《公宴诗》三首同主题的游宴诗均为初

入铜雀台、夜游西园的作品,其线索非常明显,引出如下:曹丕《芙蓉池作诗》:“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刘桢《公宴诗》:“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曹植《公宴诗》:“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游宴的活动,也写出了西园之美。这类写作眼前之具体场景,更可以说开了谢灵运山水诗的先河。

另外,曹植、刘桢、应场都有《斗鸡诗》传世,尤其是曹植对斗鸡的描写“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将斗鸡的神情、姿态描写得唯妙唯肖,且《斗鸡诗》符合了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说的“一诗止于一时一事”的说法,这些游宴活动,就是让诗歌的目的得以脱离了政治教化,走向与审美的愉悦接近,且诗作的主题缩小,就使得诗歌必须走向更为细致、更为生动的境界。

### (三) 游宴诗的应制颂德

在游宴的氛围下,因为曹操、曹丕在场,游宴诗成为邺下文人竞技文才、争功邀宠的场合,因此在文人们的游宴诗创作上,便出现了一些歌功颂德的诗句。例如王粲《公宴诗》:“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阮瑀《公宴诗》:“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布惠绥人物,降爱常所亲。”应场《公燕诗》:“巍巍主人德,往会被四方。”应场《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文中称到的“贤主”、“主人”都应该是指曹操;而文中的“公子”应该就是曹丕了。但就当时的时空背景而言,应属目中无汉,奉承曹公之语。邺下文人们对于曹操的称许,虽也有一部分发自内心、合乎实际的肯定,但难免有夸张、阿谀的成分。

### (四) 游宴诗的宴会情形

富丽喧闹的公宴场面,纵情纵欲的游戏游览,一齐进入公宴诗,真可谓“声色大开”。如同曹丕《大墙上蒿行》:“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脍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玉卮,为我行觞。”亦如王粲《公宴诗》:“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愬杯行迟。”这些内容提供了当时歌舞娱乐场所具体景象的宝贵资料,让后人得以了解曹魏清商乐演奏的情况。如此奢华程度难怪乎刘桢于《公宴诗》中慨叹“生平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能忘。”而这种奢靡纵情的宴饮场面反映到诗中,自然也就形成建安游宴诗绮丽风格,而这在创作上则落实了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的理论精神。

## 五、结论

一般传统文学史对于游宴诗的评价向来不高,是因为游宴诗多描写一些纵情声色、斗鸡饮酒等内容,但就另一个层面而言,诗歌的本质不仅只是正向、积极的生命情操体现,诗歌本身的写作技巧发挥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建安游宴诗就是在写作技巧的发展与思想上脱离了政治的附庸这两方面得到了很大的突破。在上述众多的条件之下,游宴诗促成了中国五言诗的成立与成熟,是将“诗言志”带向“诗缘情”的过渡阶段。建安游宴诗的切磋,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曹植五言诗为建安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其后有了阮籍、陆机等人的接力,将五言诗从地域性的五言诗写作(曹魏时期,在蜀国、吴国几乎不见有五言诗的写作)推广到全国性的写作。直到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可谓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不可动摇的地位。这种连续性、生命性、规律性、非偶然性的创作,可以说明建安诗歌是中国第一次的文学自觉年代。建安游宴五言诗的创作是唐代诗歌的雏形、中国唱和诗的开端,在题材上,唐人的边塞诗、山水诗、送别诗、游仙诗及唐宋词的女性描写、宋诗日常生活题材等,都可视为建安五言诗写作所开的先河。

## 参考文献:

- [1]魏宏灿. 邺下文学集团的贵族化特征[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0 (4).
- [2]张兰花. 建安文学创作区域的迁移与文风嬗变考论[J]. 中华文化论坛 2007 (4).
- [3]黄坤尧. 汉魏五言诗的成立与木斋新说的思考[J]. 中国韵文学刊 2013 (1).
- [4]夏传才. 诗经语言艺术[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5.
- [5]蔡骥鸣. 后《诗经》时期诗续断层论[J].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1).
- [6]萧统. 昭明文选[M]. 台北: 台湾古籍出版社 2001.
- [7]班固. 汉书[M]. 台北: 中华书局, 1966.
- [8]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9]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0]木斋. 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张可礼. 三曹年谱[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3.
- [12]徐德清. 邺下文人集团[J]. 德阳教育学院学报, 1995 (2).
- [13]张智慧. 论三曹对五言诗发展做出的贡献[J]. 新余高专学报 2008 (8).
- [14]马积高. 历代辞赋研究资料概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5]张振龙. 建安文人文学活动与诗赋价值观的凸现[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 [16]史培争, 尤丽. 赋的诗化与诗赋化[J]. 语文学刊(高教版) 2007 (1).
- [17]木斋.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J]. 学术研究 2010 (7).
- [18]木斋. 论建安游宴诗的兴起——兼论《今日良宴会》的作者[J].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6 (1).
- [19]张法. 略谈木斋对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推动[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 (5).
- [20]俞绍初. “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读《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J]. 文学遗产 2007 (5).

(责任编辑: 张立荣)